



向宪法宣誓

法治：以法为本 礼法合治

李飞跃

以法治国 天下至道

《管子》认为法是“天下之至道”“威不两错，政不二门，以法治国，则举措而已”。法律能够“兴功惧暴”“定分止争”，统治者只需通过法律就可治理好国家。治国不能寄望于道德教化或百姓自觉，必须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实现。商鞅主张以法代礼，“任法而治”，认为法令是“民之命也，为治之本”。韩非提出“以法为本”“唯法为治”，贤君治国不能依靠个人智慧，因为“仁义爱惠之不足用”；要“一法而不求智”，因为“释法术而任心治，尧不能正一国”“释势委法，尧舜尸说而人辩之，不能治三家”。他主张严刑重罚，“陈其所畏以禁其衰，设其所恶以防其奸”，国家能否强大取决于是否

信赏必罚

执法和司法是施行法治的关键环节，张居正说过：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。”法家特别强调法治要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。商鞅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点，提出了“刑无等级”思想。任何人即便是有功之人，犯法同样要受处罚，“有功于前，有败于后，不为损刑；有善于前，有过于后，不为亏法”。韩非主张“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。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辞，勇者弗敢争，刑过不避大夫，赏善不遗匹夫”，有功不能抵罪，“事皆决于法”。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，这对于打破贵族特权、树立法律权威、维护法律尊

隆礼重法

儒家早已提出治理国家必须把善政与法令结合起来。孔子主张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“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”，认为刑罚与德教结合才能有效。孟子也说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”。荀子主张礼法结合并施，“隆礼重法”，因为礼是“法之大分也，类之纲纪”。礼本身有约束性，是一切法规条例的总纲，对治国理政作用甚大，“如权衡之于轻重，如绳墨之于曲直”。同时，他认为法是“治之端”“礼与刑，君子以修百姓宁”，既反对“不教而诛”，也反对“教而不诛”，认为“不教而诛，则刑繁而邪不胜；教而不诛，则奸民不惩”。

汉唐时期，儒家思想虽被官方确立为正统，但施政实为“外儒内法”。继董仲舒提出“德主刑辅”的治世主张后，王充也主张要“德法并重”。唐太宗主张“礼法合一，依礼制法”，以“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”，使唐律“一准乎礼”，成为法律伦理化的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。礼法合治促进了唐朝盛世的出现，也

依法行事：“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则国弱，奉法者弱则国弱。”

法律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，不能徇私枉法，“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”，立法者也不例外。《管子》说“巧者能生规矩，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；圣人能生法，不能废法而治国”。韩非主张立法废私，“法令行而私道废”，要确立法律至上地位，“宪令著于官府，赏罚必于民心”。通过比较中西政治，梁启超指出人治为私，法治为公，应立法以治天下，因为“一人之时代甚短，而法则甚长；一人之范围甚狭，而法则甚广；恃人而不恃法者，其人亡则其政息焉”。

不别亲疏

严具有重要意义。

商鞅说：“民信其赏，则事成；下信其罚，则奸无端。”韩非也说：“言无二贵，法不两适。”让法令在民众中树立绝对权威，他们才会信仰法令；通过严罚重赏，才能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。罪与刑相称，功与罚相当，法律的权威在于没有例外，“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，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”。法大于情，不能因为个人好恶而有所避趋，因为“因喜用赏，赏不当；因怒用罚，罚不当”。如果不慎喜怒，赏罚随意，就会影响人心向背，危害社会秩序，甚至导致“亡国相继，杀君不绝”。

礼表法里

为以后历朝沿用，朱元璋就提出：“为国之道，非礼则无法，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。所以礼之为用，表也；法之为用，里也。”“礼法合治”实质上就是把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，以法的强制力量来推行礼的规范，以礼的精神力量来加强法的统治作用，可谓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。

当然，古代法律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，不免有“君本法次”“权大于法”“以法治民”“法治人治化”等消极观念的影响，有时与其说是“法治”，不如说是“治法”。在现代观念中，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形式和手段，更是一种社会价值和理想目标。对于法律传统中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，我们应批判性地吸收，创造性地转换，做到“与时变，与俗变”。这既是传承我国法律思想文化、完善现代法治思想体系的需要，也是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、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需要。

（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
我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。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关于刑的记载，如“夏有乱政，而作禹刑”“商有乱政，而作汤刑”。春秋时期，子产提出“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”，并铸刑书于鼎，开创了公布成文法之先河。战国时期，商鞅认为公布成文法，能使“吏不敢以非法遇民，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”。韩非也主张将法律“编著之图籍，设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”，使“民知所必就，而知所必去”。古人认为，要维护法律权威、信赏必罚，同时德法并重、礼法合一，才能实现“大治”。

历史名人的家训

李光地家训——

“国宪有严，亦必不尔宽也”

水海刚

清康熙五十四年，时年74岁的大学士李光地返回故乡（今福建省安溪县城湖头镇）。李光地早在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即中进士，历任内閣学士、直隶巡抚，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为官近半个世纪，政绩斐然。著名史学家陈祖武先生称其为“一代创业功臣”。在返乡前，李光地已多次向康熙皇帝提出要“告老还乡”，虽未获批准，但此次返乡之行也隐隐已有荣归之意。



李光地

李氏在外为官多年，其间虽不在家乡与京城间频繁往来，但也不至于两地消息隔绝。虽然如此，当回到家乡时，看到家乡子孙以及族人的变化，他还是大为震惊，在给地方官的一封信中他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变化。李光地直言，李氏子弟“习气甚虐”，不仅如此，“自家子弟及乡党间习染深重”，甚至“匪类窟窟者亦多”。他虽未直接言明“习气”具体所指，但想来不外乎为当时富贵子弟所惯有的骄奢蛮横之风。

作为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的过来人，李光地非常清楚这种风气滋生蔓延的后果。为改变这一现状，李光地亲手订立了一系列“家训”，目前可见的有《戒子孙》《本族公约》《同里公约》等。康熙五十六年，他奉召回朝，仍然放心不下，临行前又订立了《丁酉还朝临行公约》。除此之外，在其文集中，尚有与上述“家训”在内容上高度相似的一系列“箴文”，目前所见有《劝学箴》《惜阴箴》和《诫家后箴》。

在这一系列“家训”及“规约”中，李光地极尽循循善诱之能事。首先，他以极其丰富的人生和政治阅历告诫李氏子孙及族人：“夫世无百年全盛之家，人无数十年平夷之运，兴衰激极，存乎其人。”先辈累积下来的基业不可能成为后代长久的倚靠，并称“吾生七十年间，所阅乡邦旧家，朝著显籍者多矣，荣华枯隕，曾不须臾，天幸其可徵乎？祖泽其可恃乎？”

其次，李光地也自知李氏家族在地方“根衍枝繁，人丁众伙”，且因其在朝为官之故，家族势力日渐壮大，虽然他一再声称祖业不可倚靠，但其子孙和族人不一定能参透其中道理，从而将他的话语奉为金玉良言，因此他甘冒“刻薄之名”，只是盼望李氏子弟能在“阅世之久”后，“自知吾今日之言，是亲爱之至”。

李光地这些肺腑之言因何会为他带来“刻薄之名”呢？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诸多“家训”，多以道理服人，其中自也不乏类似李光地这样的敦敦教诲，制订“家训”的人也多以自身经验、阅历和眼光，昭示子孙后代，期盼后人在人生发展上事半功倍。但以效果言之，有些“家训”虽流传甚广，所涉道理光明正大，但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却未必一定显著。李光地所制订的一系列“家训”“规约”中，除了循循善诱之外，还辅之以国家律法，甚至是以律法为依托。他声称，“凡再实之木，其根必伤，席骄骄矜，衰落立至”“自今以往，有犯规条，我惟有从公检举，闻于官而与众共弃之，不能徇私庇护”。身居高位而不为子孙族人徇私，严以律法，以普通人情常理论之，也难怪会有“刻薄”之嫌。

然而以李氏子弟而言，其家族聚居安溪湖头（旧称感化里）已“十有余世”，俨然成为一个大家族，且族中又出了李光地这样一位高官，无形中已“泽被”众人，以致“不类子弟”日众，对于此种情形，李光地在教诲之余，辅以律法，甚至放出与其一代理学大师身份极不相称的“狠话”，称“尔不为吾惜名节，吾岂得为尔爱身命”，并直接告知子孙族人越界行为的严重后果，“国宪有严，亦必不尔宽也”，这些警示话语至今读来仍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犹回响在耳。

就这样，以教诲为先导，以律法为依托，李光地的“亲爱之言”一代代流传下来，在今日的安溪县城湖头镇，李光地故居几乎是所有参观者的必选，在故居建筑林林总总的展示品中，以李光地制订的一系列“家训”为内容的展示牌最为醒目，仔细阅读，认真体会，人们可以从中获取关于治学、处世、理政的诸多经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系列的“家训”展示牌，大多出自李氏后人之手，一代理学大师的人生经验及其传承显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。（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）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读本



到基层送法



2013年，国新办发布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》白皮书（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）



李光地故居家训展示牌

中国民间工艺

钦州坭兴陶：千年窑火 雅俗共赏

叶建军

源头。一件件出自大师之手的坭兴陶作品静静矗立。它们正用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观众作无声的交流。

钦州坭兴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、钦州坭兴陶工艺美术研究所首任所长丁艺介绍说：“坭兴陶生产工艺独特，不施釉料，采用雕、刻、剔等技法进行装饰，在制陶工艺中自成流派，所雕刻的山水、人物、花草、鸟雀等生动别致，光泽耀人，独具一格。主要采用的工艺有浮雕、平雕、线刻、镂雕等。工匠所刻诗文、书画流畅传神。”

观众在参观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惊喜：平时似乎知之不多的坭兴陶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，而且有着闪光的足迹——1915年，坭兴陶参加美国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，荣获金牌奖。1930年在比利时举办的世界陶瓷博览会上再获第一名金质奖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坭兴陶分别获国家级金银铜奖300多个；2006年和2012年，作品“高鼓花樽”“时来运转”先

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“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”认证。2008年6月，“钦州坭兴陶烧制技术”被国家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钦州坭兴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是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。坭兴陶雕刻技艺以刀代笔，将中国的书法、绘画、金石、篆刻诸家艺术融于一体，形成了古朴雅致、浑然天成的陶瓷艺术风格，尤以古朴典雅、工艺独特，享誉中外。

丁艺自信地告诉笔者：“坭兴陶近1400年的窑火，连绵至今，它是‘大俗’与‘大雅’的结合，是传统与创新的结合。尽管它土味十足，但是融入了中国传统的诗书画等意韵，不但受到文人雅士的厚爱，也为百姓大众所青睐。作为新一代坭兴人，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将坭兴陶回归自然质朴，同时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，创造出能够吸引全世界目光的、有着更高艺术水准的作品。”



华贵瓶 周秋余 陈子媚作 覃晓明摄



和谐 钟琨廷作 覃晓明摄

广西钦州坭兴陶日前在北京国中陶瓷艺术馆集中亮相。坭兴陶与江苏宜兴紫砂陶、云南建水陶、重庆荣昌陶被称为“中国四大名陶”，质地细腻、坚硬结实、音质铿锵，其特色“窑变”变化多端而不雷同。走进展厅，就如同走进厚重的历史中去探寻坭兴陶的